

“吧国公堂”档案

聂德宁

一 “吧国公堂”的沿革

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曾经是印尼古王国万丹国（Ban tam）下港的属地，原名巽他·加拉巴（Sunda Kalapa）。明代张燮《东西洋考》有载：“下港一名顺塔，……加留巴，下港属国也，半日程可到，风土尽相类云。”^①在《明史·外国传》中分别将其译作“顺塔”及“咬留吧”^②，而清代的史籍一般称其为“葛喇吧”或“甲喇巴”^③，均为 Kalapa 之对音。荷兰殖民者在 1619 年占领该地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之后，改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华侨仍大多简称其为“吧国”或“吧城”^④。而所谓“吧国公堂”，则是当时华侨对荷属东印度（今之印度尼西亚）的首府巴达维亚（即今之印尼首都雅加达）华人评议会（议事机构）的称呼。

早在 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基地后不久，荷印公司的第三任总督燕·彼得逊·昆就任命了华人富商苏鸣岗为华人甲必丹（荷兰文 Kapietein 的音译，下同）来专门处理吧城华人内部的民政事务。到 1633 年，设立雷珍兰（Luitenant）一职以协助甲必丹工作，并设华人兵卒 1 名，以供甲必丹使用。为了适应吧城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的形势以及加强华人甲必丹的工作效率，荷印殖民当局于 1639 年再立雷珍兰 1 名，1689 年又增设雷珍兰 2 名，到 1707 年时，又再增设 2 名雷珍兰，因而共计有 6 名雷珍兰协助甲必丹工作。此外，华人义冢、医院（养济院）以及书院等亦相继建立，并设立土公（埋葬事）、武直迷（Bocdel Meester，专理孤贫福利）以及华人街区街长（Wijkmeester）等职务，协助甲必丹和雷珍兰的工作，共同负责这个城市里最大的种族群体——华人社区的社会福利。这些人在税款的收集、年度的人口调查以及维持治安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以及属下类似于中国的地方官府。

据记载，“吧国公堂”始设于 1742 年，亦即吧城“红溪惨案”后的第二年，当时新任的吧城华人甲必丹林明光向荷印殖民当局请建甲必丹府，名为“吧国公堂”（俗称公馆）。该公堂建筑巍峨，门绘神像，建筑风格类似于中国的衙门，地址在吧城城北的旗竿街（Tiang Bendra Street）。公堂既立，每星期三在此开堂审理案件和讨论华人社区的公益等问题。由于事务日繁，到了 1750 年增设朱葛礁（Secretaris，书记官）一职为公堂的秘书，以协助甲必丹的雷珍兰处理日常事务，即所谓“大朱”。至 1766 年又增设 1 名朱葛礁为副书记官，是为“二朱”。遂有 2 名书记负责协助处理公堂的日常事务。1837 年，吧城华人甲必丹陈永元升任妈腰（Majoer），总理公堂事务，于是公堂遂成为吧城华人妈腰之公署^⑤。1861 年，公堂迁到位于吧城城南的中港仔（Tongkangan）地区比较宽敞的房屋，并且一直保留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房屋被拆除为止。

可见，所谓公堂或公馆，是巴达维亚华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共同携手监督华人社会和对华人社会内部的事务，包括教育、公共墓地以及寺庙进行管理的半自治的组织机构。“公堂者，所以奉公勤民，凡有利于公者，无不咨而谋之，举而措之，以笃庆士林也”^⑥。自公堂建立之日起乃至 20 世纪初，公堂负责管理一些私人产业，这些产业公馆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卖，是

华人评议会（亦即公堂）主要收入的来源。直到太平洋战争后，由于公堂在日本占领时期及战后初期失去了许多它从前的行政功能以及其所遗留的地产，华人评议会被解散并被重新组合到各个分散的寺庙基金会和义冢社团。

二 “吧国公堂”档案及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一个荷印殖民当局核准的华人半自治组织机构，“吧国公堂”不仅拥有对吧城华人的内部事务行使监督和管理的权力，而且还珍藏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物和档案资料。其中有5块悬在公堂之内以历代甲必丹及妈要的名义撰写记述“吧国公堂”历史和沿革的木牌，以及记述吧城华人艰苦创业的珍贵历史文献《开吧历代史记》。著名的东南亚史和华侨史专家许云樵先生曾经在50年代初对上述公堂中所悬之木牌以及《开吧历代史记》进行注释和校注，其成果为海内外华侨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广为引用。然而，更为大量的公堂档案，包括吧城华人评议会每星期三的会议记录，华人入境、结婚、离婚以及死亡的登记注册，以及公堂的收支帐簿等等。这些档案记录在1955年被华人评议会的最后一任秘书陈鉴福转移到雅加达的自家住地。此后，这批公堂档案历经劫难，长期未得妥善的保管和充分的发掘，以至多有破损和遗失。直到1995年经过荷兰莱登大学历史系的包乐史（L. Blussé）教授的多方努力，这些“吧国公堂”的残存档案捐赠给了荷兰莱登大学汉学院，从而使这批秘而不宣的珍贵历史档案得以重见天日。

现保存在荷兰莱登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吧国公堂”档案残件，重约600余公斤，共计800多卷本^⑦。现存的“吧国公堂”档案涵盖170年（1775—1950）左右，主要由以下几种卷本构成：公堂通知簿、公堂公案簿、户口簿、公堂清册簿、婚姻簿、冢地簿、寺庙簿、出生簿、文化教育类等。其中，公堂通知簿的内容为吧城华人评议会发布的通知和文告；公堂公案簿的内容是吧城华人评议会开堂审理案件和讨论华人社区公益问题的记事录；户口簿中的内容包括职业和家庭；公堂清册簿为财务收支往来账簿，包括日清簿和总清簿；婚姻簿中包括结婚登记簿和离婚簿。这些档案大多为中文毛笔记录，少量卷本为荷兰文和马来文，而马来文所记录的部分多是1920年以后的资料。可以说，公堂现存的档案包含了吧城华人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吧城华人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吧国公堂”档案的价值，首先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唯一出自华人社会内部观点、并用中文记载的丰富广泛而又有序的华人社区人口和社会的资料。众所周知，19世纪的巴达维亚及其周围地区（如新加坡、曼谷以及马尼拉等地）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海外华人居留地之一。虽然在新加坡有成套的英国殖民地档案资料，而在巴达维亚也有成套的荷兰殖民地档案资料，但是在这些文献中没有提供给我们来自华人社会内部本身的观点。所以，“吧国公堂”残留的档案构成了唯一幸存且又相对完整的一个较大的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档案。

其次，公堂档案涵盖的1775—1950年间的这一时期，跨越了从东印度公司统治到荷属殖民地统治，在1890年后又经历了从勉强的帝制到殖民风格政府的过渡，接下来是印尼人和华人民族主义兴盛的时期，教育与社会事务的重新改组，而后是日本人短暂的占领时期，最后是公堂权利的丧失和公堂组织的终结。在现存的公堂档案中，从1887—1920年这一时期所有32卷的华人评议会的中文记事录，其字数达600余万字。1920—1940年的记事录由马来文组成。因此，对记事录残卷的内容加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将使我们得以洞察一个处在变革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的社会生活及其行政管理的内幕。

其三,在以往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研究中,大多着重于华人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在对当地华人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等方面,则囿于资料的缺乏而未能加以深入的研究。现存的公堂档案中有关移民、人口调查、婚姻及死亡的档案人口资料,将最终向我们展示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人口变迁及其社会结构演变发展的一幅更为清晰的画卷。除此之外,其他文种诸如英文、荷兰文的档案资料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如此清晰的吧城华人生活画卷。通过这些华人公馆档案,我们可以获取诸如华人生活状况、性别比例、家庭规模以及移民形态和多元文化的通婚等有关课题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其四,现存的公堂档案,不仅可以同18—19世纪有关吧城华人社会的其他中文史料,诸如:吧国公堂内所悬挂的木牌以及其所珍藏的珍贵文献《开吧历代史记》、程日介的《葛喇吧纪略》、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以及傅吾康先生主编的《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⑧等相互印证和补充,而且还可以同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档案资料,诸如:《吧城日志》、《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吧城布告集》、《殖民地档案文书》以及莱佛士的《爪哇史》等西文史料中有关吧城华人社会的记载结合起来相互参照和引证,从而使得我们对这一时期吧城华人社会的发展以及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和了解。例如,在《开吧历代史记》中所记载的华人开吧纪年,始于1610年冬至1795年,其中“历代开吧王位表”及“历代甲必丹、雷珍兰姓氏名次”的年代止至1840年,而现存的公堂档案所涵盖的时期为1775年至1950年,正好可以弥补《开吧历代史记》中所缺乏之年份。

三 “吧国公堂”档案研究现状

有关“吧国公堂”中所悬之木牌及其所珍藏的珍贵历史文献《开吧历代史记》的史料价值,向来为海内外专家学者所重视。胡廷克(B. Hoetink)是最早提及上述公堂档案的荷兰学者之一,他在1922年撰写《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吧城华人官员》一文时,就曾根据公堂中所悬木牌上的记载来查证吧城华人官员的名单^⑨。最早的《开吧历代史记》版本是1840年文德浩(Mendhurst)的荷文译本,刊载于《荷印学报》第三卷,第二辑;其次为1905年荷兰皇家吧城学艺会的藏本,刊载于该学会会刊1905年9月号;其三为何鸣海于1924年7月刊载于《侨务旬刊》第130期的版本;其四为“吧国公堂”所藏之抄本,此抄本毁于日军占领时期,幸好陈育崧先生于1940年时去吧城时曾手抄一部,50年代初许云樵先生所校注的《开吧历代史记》就是以这一抄本为原本^⑩。

公堂档案的研究和运用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研究者不仅必须精通有关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必须对荷属东印度时期的殖民地档案文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公堂档案进行有关课题的研究。对于现存公堂档案的研究和利用直到本世纪70年才开始。最先利用公堂档案的残件进行研究的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克劳狄娜·苏尔蒙(Claudine Salmon)和丹尼斯·龙巴德(Denys Lombard),他们在1970年未曾参考公堂档案中寺庙簿的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雅加达华人宗教生活的开拓性著作^⑪。第一个试图对残存的公堂档案进行分类研究的是荷兰学者玛娜·丝德海塔(Myra Sidharta),她曾在1991年撰文对“吧国公堂”的残留档案的内容作过专门介绍^⑫。目前,这批保存在莱登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吧国公堂”档案残件已经由荷兰莱登大学历史系包乐史教授、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的程绍刚

博士与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吴凤斌教授共同合作完成了分类和编目工作^③。

公堂档案中的户口簿册和婚姻簿册及冢地簿册保留了近两个世纪吧城华人大量的有关移民、人口调查、婚姻及死亡的档案人口资料。在这一时期，吧城不仅是荷兰东方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荷属东印度华人人口的分布中心和经济中心。“尽管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领地内，从南印度到摩鹿加群岛都有华人居住，但没有一个地方拥有象吧城这样多的华人以及这样稳固的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④。所以，吧城华人人口的升降与变迁，一方面反映出吧城华人所处的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荷兰殖民统治者是如何通过种种政治经济措施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华人经济的盛衰，以及其对华人人口升降的影响。为此，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的程绍刚博士拟设计一套中文电脑数字程序，用于输入上述档案中的户口、婚姻、冢地等各卷本的有关资料，并结合相关的荷文的有关资料，对荷属东印度统治时期吧城华人的口变化及社会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考察。同时，还可以根据这些新近得到的资料与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人口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总之，通过对现存的“吧国公堂”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出版，并加以充分的研究和运用，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吧城华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吧城的华人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当地努力生产、安居乐业，并且在当地繁衍生息、世代绵延，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注：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西洋列国考”；又同书卷九，“舟师考”有云：“下港，……舶人亦名顺塔，再进入为加留吧。”中华书局1981年版点校本，第41—44、179页。

②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324，“外国传”五，“爪哇”条；又同书卷325，“外国传”六，“和兰”条。

③ 清代有关南洋的史籍大多称之为“葛喇吧”，诸如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上卷，“南洋记”；谢清高《海录》，“葛喇吧”条；程日介《葛喇吧纪略》等。称“甲喇吧”者，则有顾森《云庵遗文》中的“甲喇吧”条。

④ 参见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载《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1953年；又王大海《海岛逸志》卷末，“葛喇吧后记”。

⑤⑩ 许云樵《开吧历代史记校注本弁言》，载《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第1—3页。

⑥ 许云樵《吧国公堂与华侨史料》，载《南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二辑，1955年，第20页。

⑦ L. Blusse, “The Kongkuan or Chinese Council of Batavia”, (包乐史《巴达维亚的华人公堂或理事会》)，载庄国土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6页。

⑧ 傅吾康主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版。

⑨ B. Hoetink, “Chineesche officier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胡廷克《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吧城华人官员》)，载《荷印语言、土地与人民》第76卷，1922年。

⑪ Claudine Solmon & Denys Lombard, Les Chinois de Jakarta, Temples et vie Collective, Ann Arbor, Michigan, 1980.

⑫ Myra Sidharta, “On the Remnant of the Gong Goan’ Archives in Jakarta: A Preliminary study”. In Lin Tien-wai ed, Collected Essays on Local History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PP. 513—523, Hong kong, 1991.

⑬ L. Blusse, Cheng Shaogang & Wu Fengbin,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Chinese Raad of Kongkoan te Batavia (1775—1950)”, Leiden, 1996.

⑭ J. Th. Vermeulen, “Some Remarks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the Compagni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Respec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费慕伦《十七、十八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有关华人的司法行政》)，载《南洋学报》第十二卷，第二辑，新加坡1956年版，第4页。

(作者聂德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邮编 361005)

(责任编辑 王 激)